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六九九期 ——
(二〇〇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904d)

| | | |
|--------|---------------------|--------------|
| 【运动记愧】 | 我们为什么会助纣为虐——我的自白和反思 | 王炼利 |
| 【亲历者言】 | 李震之死 | 施义之口述 • 陈枫整理 |
| 【各抒己见】 | 没有“粉碎四人帮”，中国后来会怎样？ | 曾节明 |
| 【往事追忆】 | 与军管会较量 | 戴维堤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运动记愧】

我们为什么会助纣为虐——我的自白和反思

• 王炼利 •

今年（2005年），我就读过的中学校首次举行校庆活动。我向37年未见面的班长建议，去看看班主任，他80多岁了，已瘫痪在床。班长未置可否。

过些日子，我又向班长建议，班长悄悄对我说：“我不敢去。”
“为什么？”

虽然班主任被当成“特务”批斗有我们班学生的一份“功劳”——他带我们春游时在吴淞口军事要塞附近给手表上弦了，他以前是从不带表的。文革一开始，同学们觉悟了：教物理课的班主任就是国民党特务机关安在我们身边的定时炸弹，就把他给“揭”了出来；不过，对班主任大打出手的不是我们，我们也是文革受害者，老师会原谅我们。我这样想。

“你不知道，那天他被人一脚从楼梯上踢下来，倒在楼梯转角平台处，我正好从楼下上来，他跪在我面前，叩着头对我说‘我求求你，你让他们不要再打我了，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却没有理他。想到这些，我不敢去见他。”内疚写满班长的脸。

“但是，这事摊在任何一个同学面前，都没有人会去救他。整个文革期间，我们都做过内疚的事情，谁也跑不了。”我对班长说，也象对我自己说。

当年，凡“牛鬼蛇神”都是有标记的。奥斯维辛的犹太人胸前挂有耻辱的黄标记，“牛鬼蛇神”挂的是耻辱的黑标记。一天中午时分，我看到一个没教过我们课的“牛鬼蛇神”正要出校门，出校门前却悄悄把挂在领襟下的黑标记朝衣服里面折进去，我发现了，马上命令让他把黑标记亮出来！对，就是“命令”，我当时是“红卫兵小将”，当然有资格命令“牛鬼蛇神”！我觉得自己做得很正义，“牛鬼蛇神”就该接受大家监督的。

有个女教师被她班上的学生剃了光头，从此她就带上了一顶天蓝色的女工帽，那种效果有点象尼姑。有一天，一群学生把她的帽子给掀了，帽子扔到了我肩上，顺着我的肩又滑落到我手上，我感觉到帽子带着体温！顿时我象被火焰灼着了手，一下把帽子扔到地上，马上又有人把帽子拾起来，抛着、扔着……，在带体温的帽子碰到我手时，我心中最柔软的地方肯定被触动了，因为我的心那么明显、那么有记忆地猛颤了一下！可我怕这样的“颤动”，这样的“颤动”证明我还是爱憎不够分明，证明我还残存着“小资产阶级的温情”，所以，我赶快把帽子扔掉了。

那一天，一群老师在我们的脚下爬着，看到老师们尊严扫地，学生们享受着快感。那个死不肯认罪的女教师终于也跪下了，在她双膝着地的瞬间，她“呜”地哭出了声，学生们为之欢呼起来！在爬行队伍中的还有一个满头白发高高胖胖的男教师，他成为“牛鬼蛇神”的过程是蛮戏剧性的——学校中的“革命老将”还只是凭感觉认为他“应该是”牛鬼蛇神，就和“小将”一起设计个“阳谋”：召开个吓唬吓唬他的会议，看能吓出点什么来。会上，小将老将都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你的问题全部被我们掌握了，现在给你五分钟时间，你不坦白，我们帮你坦白。你是想从宽处理还是从严处理，自己选择吧。”接着便进入了倒计时，一个男声很有威慑力地拖长着声调：“还有——四分钟……还有——三分钟……还有……”，“不不不，我坦白，我坦白！”只见黄豆大的汗珠从白发苍苍老教师的额头上滚落下来，他等不到引爆就崩溃了，像竹筒倒豆子一样把什么都抖落出来了！这当然是“思想”的伟大胜利，也是我们的伟大胜利：只不过吓唬吓唬，就吓唬出一个货真价实的历史反革命来了（他后来也平反了）！他抖落些什么，我唯一记得起的是“三青团员”，其他全部都忘了，我不会忘记的是，我当时是众多喊着口号逼他交代问题中的一个。也是参与这“阳谋”、自认为是胜利者中的一个。

我在场，我没有参与欢呼。但那是没有功夫欢呼——我自己同自己打架还来不及呢。一个“我”说：“太过分了吧”，另一个“我”反驳“这是革命需要！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一个“我”辩解：“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羞辱人嘛！”另一个“我”声音更高：“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终于，后一个我彻底战胜前一个我，铁定的真理是：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这些“牛鬼蛇神”肯定过去对人民很残忍，现在就不能同情他们！

现在是2005年5月8日，在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上海，我使用着电脑这种先进传媒工具，向着年轻人占压倒多数的网络朋友谈论上世纪60年代那些荒诞不经的往事。我要向年轻的朋友们、向我们的后代坦白，这就是一个十多岁的少女，在那个疯狂年代里眼观疯狂参与疯狂时的内心独白，真实的内心独白。最后，是革命的理性战胜了小资产阶级的感情。革命胜利了！

如果问，当年未成年的我们为什么会这么冷血？为什么会这么无情？怪我们接受的教育不人道？不对。当年“小学生守则”、“中学生守则”上第一条就是“要尊师守纪”，教室也是挂着“尊师守纪”的标语，我们曾恭恭敬敬地对老师鞠躬，亲亲热热地喊“老师您好”，这样的我

们怎么一下子从温顺的“小绵羊”变成了阎王殿的小魔鬼？是的，小魔鬼，在当时被打成“牛鬼蛇神”的老师眼里，我们这些“红卫兵小将”才是真正的“牛鬼蛇神”，真正的小魔鬼。

◇ 昨天，我们色厉内荏地“助纣为虐”

我们怎么会变成了这样？多年以后，我找出的答案是：那时，所有的人都在害怕，潜意识里的害怕，打有彻骨记忆印痕的一种害怕。所有人都担心厄运会降临到自己头上，所有的人都想“避险”，甚至不择手段的“避险”。当发现“行恶”能“嫁险于人”又能使自己“避险”，一些人就选择了行恶。坐观恶行无动于衷，还算是那个年代的“善行”呢！

我们害怕什么呢？我谈谈自己的亲身感受。

1967年7月，为纪念“8·18”接见红卫兵一周年，上海准备举办盛大庆祝游行。我也被选入红卫兵方队参加排练。我很兴奋，这在当时，意味着一种比较有规格的“身份承认”！但有一天红卫兵头头找我谈话了：“我们已经知道你的家庭有些问题没有搞清楚，为了红卫兵队伍的纯洁性，你不能参加这次游行了。”真是如雷轰顶！我就是从那天起，从14岁半起，知道了心被击碎的滋味，知道了被击碎了的心是会痛的，会很痛很痛的！我哭得气都缓不过来，回家后，是腹部剧烈的疼痛，疼得我在床上翻滚，但我咬紧牙关，不哼一声，当时心里已连死的念头都有，觉得还不如这样死去！以后我看了一些医书，猜测到当时的腹痛可能是强烈的精神刺激诱发的肠痉挛。

让后人无法理解、自己后来也感到过分的是，不就是不让参加游行嘛，值得这样吗？其实，情感上波动和肉体上剧痛只是表象，表象的后面，是一个未成年的灵魂在颤栗，面临巨大恐怖和孤苦无依时的灵魂颤栗！

我害怕的到底是什么？

我害怕的是：从此被划入另类，成为“黑七类子女”（黑七类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资本家、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那样的另类）！1966年夏天，北京的红卫兵到我们中学“煽风点火”（当时这是个褒义词）搞串联，来的全都是十七八岁的“女兵”，一个个腰扎宽皮带，身穿洗得发白的有四个口袋的军装，风纪扣扣得严实，水壶和黄军包在胸前交叉挎着，一手叉腰，一手挥舞着语录教训着上海的中学生：“我们北京有个口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事实就是这样嘛，我们就要造反动派和他们狗崽子的反！”然后，解下皮带就抽“牛鬼蛇神”，给我们以“革命行动”的示范。这一幕牢牢印在我的心里——至今我还记得那几个红卫兵的脸和神态。从那时我彻底明白，只要是“牛鬼蛇神”的后代，“重在表现”是不能兑现的了，他们从“共产主义接班人”的队伍中被抛了出去，他们已没有“前途”，他们也没有朋友：想有个“前途”的人要躲着他们，同样没有“前途”的同类之间不能来往，来往就是“反革命串联”。他们只能在鄙夷的眼光下承受不是这个年龄的人能承受的屈辱和孤独。还有着几十年活头的花季少年活到这一步，就生不如死。所以我听到自己家庭“有问题没有搞清”，就反应激烈、甚至激烈到“死”都无所谓，这其实很正常；而关碧红会精神分裂，也是那个时代造成的必然。

潜意识里根植了这种“害怕”，那么，避险，就是人的潜意识里的一种本能。怎样“避”呢？既然害怕孤独，那就“从众”吧，不想被“大流”抛弃，就与“大流”注定要抛弃的“一小撮”划清界线吧。既然连“对政治不感兴趣”都影响到过安稳日子，那么，就参加政治运动吧！你们要打倒谁，就跟着你们喊“打倒”，你们说拥护谁，就跟着你们喊“拥护”。潜台词是“我听你的，我跟你走，还不成啊？你就放过我吧。”

当行恶变成社会常态、当无语地坐观恶行也能差强人意当作“善行”，“从众”和“随大流”就不想无情也无情了。文革时期，“揭发他人”竟然成了保护自己的一种手段，“相互揭发”，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平民司空见惯的行为。

你说：“我家三代贫农，搞阶级斗争搞不到我头上。”话音刚落，你被“隔离审查”了，就因为你好友的哥哥定性为“五一六”分子，而有人揭发你与你好友的哥哥在一起玩过；你要去参军，政审都通过了，突然宣布你不能去，有人揭发你远房婶婶她父亲刚被专案组调查出是逃亡地主。

你现在正写着大字报，毛笔头掉了，你就说了一句：“呀，毛笔头掉了”，有人就大声揭发：“啊！你这么反动，竟敢攻击伟大领袖！”你一下子百口莫辩，就这样成了“现行反革命”，被“勒令”“六进六出”（六点上班六点下班）；你刚到“牛鬼蛇神”队伍报到，看到昨天“揭发”你的那个人竟然也在这个队伍里了，原来他太得意了，想炫耀自己是怎样发现了身边的阶级敌人：“你知道那家伙说什么吗？他说（一下声音轻了下来）‘毛头掉了’！”他这一炫耀就把自己炫耀成了“牛鬼蛇神”，罪名是“扩散反革命言论，别有用心”。那年头，当“反革命分子”是防不胜防的，而积极揭发他人的将自己也搭进去，也不是新鲜事。

我的初中同学早在1965年就到派出所揭发她母亲“叉麻将”，接下来她就成了我们少先队员的学习榜样，再接下来她就入团了。

走在马路上，都随时能发现“揭发行动”：前面走的人将吊唁家人的黑袖章与红袖章套在一起，被揭发了；边上有人买了张报纸就朝公共厕所跑，有人就跟进去，“等待揭发”——这时十有八九可以抓个现行反革命——每一张报纸上每一版都有领袖语录领袖像，就看他是怎么处理这张报纸吧！

阶级斗争既然要年年讲、天天讲，肯定有大量的阶级敌人待揭发。主流社会鼓励这种“揭发”行为，揭发他人是政治上要求进步的表现。而能理直气壮、堂而皇之地揭发他人，既表现了自己的“革命立场”，也能显示自己在“革命造反组织”中的份量。

为什么那么多中共地下党员在文革中都被诬蔑成“叛徒”？因为地下党员边上围着急于通过“揭发”来表现、来立功的一族。为什么要盯住地下党员呢？因为“地下党员”这一块才有着“抓叛徒”的最大油水。反正那么多地下党员牺牲了，而你没有死，这个事实本身就是你叛变革命的最大嫌疑！

想“避险”，都已经避之不及。

在这样的社会中生活，人人恐惧命运的无常。人人随时都面临“你不配为人”的审判。

为什么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说变就变，变得如此野蛮残忍？

只因为文革需要野蛮残忍，不野蛮不残忍，文革进行不下去。

◇ 我们吃了自己的良心，天地在狞笑

文革一开始就着力破的，是中国民间的道德信仰“凭良心做人”。这是以“阶级斗争”理论为武器破掉的。

“凭良心做人”，本是规范中华民族行为道德的“不成文法”，根植于荒郊僻壤村妇愚夫的心中，比孔学儒学更具普遍性。“凭良心做人”对人的行为约束是“人不能为所欲为”，人必须有所敬畏，有所怕惧；违背良心，不凭良心，则要遭报应，不报应自己，也要报应子孙。因为有所敬畏，因为要“凭良心”——如浙地谚语所云“上半夜想想自己，下半夜想想人家”——邻里街坊间各行各业间才能相安无事，和睦共处。然而文革恰恰不许平民“相安无事”“和睦共处”，最高领袖要亲自指挥全民“斗”，不要怕乱，“七亿人民，不斗行吗？”当然，最高领袖对怎样斗、斗什么、重点斗的范围在哪里、斗到什么程度他心里就是一盘策划好的棋，但七亿人民原被“凭良心做人”管着，斗天斗地可以，全国范围斗人，斗的还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甚至包括亲朋好友老子娘，这阵势过去没有见过，现在已经被吓着。于是，最高领袖走到台前，向民间召唤千百万无所畏惧者、为所欲为者。从此，“凭良心做人”这一民间的做人道理在最高领袖的胆魄和无所畏惧者的行为前溃塌，这个世界只有一个道理：“造反有理”。

最高领袖此刻在召唤赌徒。文革要颠覆人们习以为常的社会秩序和风俗习惯，只能倚仗无所畏惧、为所欲为的赌徒。造反，是文革时期只需要赌徒的勇气不需要赌徒的本钱的买卖。*赌徒的勇气是什么？就是敢于为“施恶”冒风险。毕竟，中国还是个文明古国；毕竟，“打砸抢”从来都是遭天谴的恶行，“施恶”是伤天害理的。文革来了，“施恶”成了大力提倡大力支持的“革命行动”，这大跌了当时人的眼睛。回头想来，其实从文革初期开始，“施恶”就不需冒多大风险，赌徒只需将宝押在四个字上：造反有理。将“最高指示”押上了，他们必赢无疑。

当恶行与神圣不能诋毁的“革命”结盟，恶行就能施遍全中国。

人们在忐忑不安中渐渐看懂了如何适应这个无法无天的社会：只要能“紧跟”，就不在乎你干了多少恶事。“看懂”了，就学乖了。既然“革命”势不可挡，大家就顺势而为，被“革命”裹挟，被裹挟着“革命”。

整个社会变态了，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就是一座专演荒诞戏的大剧院。人人都在荒诞戏中跑龙套。

我年纪虽然小，也是积极跑龙套的主儿。1966年，刚带上红卫兵袖章的我挺想炫耀一下，刚好看到我家弄堂口的文具店里墙上贴有“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标语，我鼓了下勇气，进门亮开嗓门：“最高指示：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就像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然后满脸严肃：“同志，你们墙上的标语是刘少奇‘阶级斗争熄灭论’反映，应该取下来”。柜台里的人赶紧回话：“谢谢革命小将，已经有小将指出过了，我们马上取下来。”那一瞬间我比将军还神气！我只有十四岁，“大人”们都听我指挥！

这是一个“比傻”的社会。傻了，说不定还可以指使别人，支配别人。表现越傻，在别人看来你还越革命。

这时的中国，除了人体进食和排泄的部位没有颠倒，一切都颠倒了。在这块土地上活着的人们只能迅速适应颠倒——不适应颠倒，是要被打倒的。一把革命的大扫帚在头顶上挥舞，人，就是一堆随时会被扫进历史的垃圾。

自那以后，从少年儿童到襁褓中的婴儿此后十几年不知道中华文明为何物！

文革结束第四年，中国终于开展了声势浩大的针对成年人的幼儿园教育活动——1980年，由中华全国总工会、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爱卫会、全国伦理学会等9个单位联合发出

《关于开展文明礼貌活动的倡议》，号召大家“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1983年，这场幼儿园教育运动改由中央书记处书记亲自挂帅，目的是让“社会风气尽快好转”！

堂堂中华，公然以不讲道德为荣、以不讲文明为荣、以不讲礼貌为荣，并作为一种时代提倡的行为——那时称这些行为是“造反派的脾气”——仅仅发生在1966年到1976年！但是其恶果，一直延续到现在——现在的中国还是“礼仪之邦”吗？那属上辈子人和祖上的荣耀，从我们这一代开始，已经不好意思沾光！

现在，造假作假、人虐待人的奇闻不绝于耳，造假作假、人虐待人已经到了丧尽天良的地步。当丧尽天良的作为也能“普及神州大地”时，作为中国人正该想一想，如果没有1966年开始的那场腰斩了中国传统道德文明的“革命”，如果不是有两代年轻人从小生活在将无知无耻当有趣的社会里，中华民族会遭这样的报应吗？没有一点文明根基的蛮荒社会才会这样丧尽天良！1966年的那场革命，是让中华民族重返洪荒！

四十多年前司空见惯的是无法无天，四十多年后司空见惯的是丧尽天良，是宿命？是报应？反正，报应是远没有到头。

◇ 我们欢呼“万岁”！也在伟大领袖下战兢

至今，对于文革到底想颠覆什么，文革动静为什么要这么大，我们还回答不成囫圇。

肯定回答不成囫圇。因为好多档案还没有解密呢。解密了的，普通人也不一定看得到。但我们总不能坐等文革档案解密一天再来谈文革吧？我们就说我们的亲身经历和亲身感受，总可以吧？

说文革是“摧枯拉朽破四旧，雷厉风行立四新”，且不说新东西靠“雷厉风行”立不立得起来，先问文革到底破了哪些旧东西？

没有，文革根本没有“破旧”。相反，文革空前彰显光大了千年旧东西——皇权。文革时期，中国的皇权才发展到了登峰造极——一个人就可以打到一大群人，一个人就可以决定亿万人的命运，一个人就可以发动一场全国性的“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古今中外，没有一个统治者有这样的本事。

最高领袖早已经是中國最有权威的人，他为什么还要这样做？

回顾横跨了19个年头的最高领袖的两段话吧。一段是众所周知的，即1945年对黄炎培所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还有一段是1964年底在一次会议上对刘少奇说的，我第一次见到这段话是在1998年薄一波公开发表的文章里：“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根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同样的一句话，在1966年4月也说过，不过对象不同：“彭真是混到党内的渺小的人物，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一个指头就捅倒他。”

两段话，我相信反应的都是真心情。1945年时，他是这么想的，1964年时，想法不一样了。1945年时，他是边区领袖，要走民主新路。1964年时，他是全国领袖，已“万岁”了十五年。

领袖是什么？领袖是人，和你和我一样的常人。常人，就是有着普通人情感的人，有着普通人计较的人。

当了十五年“万岁”，魏征式的人都赶跑了。发声“我动根小指头就……”，相当正常了。

普通人家里有着说了算的老爷子，中国这个“国”就是“大家”，最高领袖就是“大家”的老爷子——在这块土地上，最高领袖除了是老爷子，还能是什么？

既然承认是老爷子，就动不得小指头吗？当然，真动起来，就不是小指头，而是金箍棒了，小指头一动捅一个，金箍棒一搅全无敌。

老爷子的诗人气质、他的权力无上、他的刚愎自用纠合在一起，注定中华民族难逃一劫。这个天才的浪漫派诗人喜欢李贺的“鬼才仙语”，李贺诗歌特别敢想象，想象瑰丽奇崛又海阔天空，文思既跌宕跳跃，大开大合，又透着诡谲和捉摸不定。这正合老爷子的诗人气质。“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新中国”这张白纸，就是由着老爷子的诗兴在“大写意”。

老爷子的喜欢唐朝三个李姓诗人。李贺有才早亡，李白怀才不遇。不过谅是没有什么皇帝敢给李白干事的实权，即使大唐政权像天上落馅饼落到李白手上改为“谪仙”朝，那“谪仙”朝肯定毁于浪漫。诗人气质不是治国的气质，治国需要务实，需要严谨。

然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人就是在跟着诗人领袖的浪漫曲起舞！这支浪漫曲是伴有杀气的，旋律是跳跃又捉摸不定的……

好诗人兼有杀气古而有之，最有名的是曹孟德。“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就算是杜撰，刚愎自用总是其性格特征。老爷子与曹孟德是惺惺惜惺惺，老爷子自己亦是刚愎自用的。刚愎自用的政治家加上浪漫诗人，才会算出6亿5千万人中有1 / 65是坏人，需要洗刷几百万。他对数字不敏感，几百万一千万人在他心目中大概与“白发三千丈”是差不多的一回事，他对“死人”一向抱不在乎的态度，洗刷了就洗刷了，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但他又容易动感情，容易流泪，他的无情和他的动情，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有诸多相似。

中国人不是命运能不能掌握在自己手里的问题，而是这命就不属于你的。你的命由别人给安排了。当年是老爷子在安排，老爷子挥手你前进，老爷子指向哪里，你就奔向哪里。老爷子怎么说，你就怎么做。至于为什么要奔向那里、为什么要这么做，那是老爷子的高瞻远瞩，你的水平根本不够理解。你只要紧紧跟上，就什么都别问了！

我们能不助纣为虐吗？

◇ “尊神”被伟大小指捅倒时，革命人在做白日梦

最高领袖治国，真的是想让国兴旺——谁不想让自家兴旺？最高领袖爱民，是爱“子民”，也爱得真切（历史上，朱元璋也是深知底层百姓疾苦体恤民情的，同时他又给百姓造成了疾苦）。那共和国的其他领导那些书记们、将军们、总理们、还有个副主席，最高领袖视他们为何方尊神？他们都是“管家的”。最高领袖一生一大不如意，是没有什么称心的管家。他一直在选择管家，观察管家，家是他的，他当然要选择好管家。但是，管家不能按管家的心思管，必须照最高领袖的心思管。因为这是最高领袖的国最高领袖的家，最高领袖自有打算。管家如果要按管家的心思管，就要怀疑管家是否有替代“主公”的野心了，并且最高领袖对自己认定的管法极

为自信，战争年代战无不胜，建设时期为什么不能战无不胜？世上原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他急于实现他的管法，他急于“日月换新天”，他急于“旧貌变新颜”，他急于去拍死“小小寰球”的“几个苍蝇”……管家有时也发急，说这样管下去不行，是要死人的！死人也是死我的子民，管你什么闲事？你说死人你管家也有责任？你这不是承担责任，你是绕着弯说这是我的责任！你都管到我的头上来了，你就等着吧！管家最要紧的是要听话，不听话，自搞一套，你以为你是谁呀？你有什么了不起？你不过是个管家！我明天就可以不用你！

不过，管家也是管老了的，中国那么大家业，管家也有一群。最高领袖这么干，管家们都同病相怜起来，大家不用合谋都同一个想头：您可以有不用我们的念头，但您做不到。您没有管过具体的实事，您离开我们寸步难行。实话说吧，都照您说的干我们干不成事，回头还是要落不是，那只能您说您的，我们干我们的。不过我们尽量不驳您的面子，我们会敬着您，会让着您，您刚“万岁”那会儿，我们就明白这个国谁说了算，咱管家们都是“万岁”年间落地生下的，懂得这个规矩。

管家们心齐，最高领袖洞若观火。他知道事情的难办：毕竟管家管了多年，家国人都认可了管家，甚至把管家都当主子敬了。但他决不能妥协，他要主动出击。他认为管家将他的管事理念都篡改了，这是与他对着干，在分庭抗礼，也说明管家在“逼宫”。他认为他的理念是正确的，是能永放光芒的，是不容置疑的，谁质疑就必须给予彻底的无情的反击。是到了“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的时候了！

怎样反击？这个是最费心思的。一步步棋局怎么走，都要深思熟虑，思虑到胸有成竹了，干起来就挟雷霆万钧之势，有声有色。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是，最高领袖直接到天安门广场去——“一声风雷惊世界”了！在最高领袖跨出宫墙门的一刻，他真有理由鄙夷那些管家们：你们是我的对手？

但他到天安门不是去找新管家的。他到天安门是要告诉管家们：别想拿我当“牌坊”，我的根基厚实着。你们中一些人会死得很惨，也因为你们，会牵连到一些人也死得惨，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也很正常。这样死过一些人后，你们会听话的。你们的威风体面还有知识分子的威风体面我是不给了，朱元璋也不给的，我们有共同语言。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的国家，都是为了我的人民，我要为我的人民安排一个好未来。我问心无愧。我是没有私心的，儿子一死一疯，明太祖为儿子拔荆棘的事，我做也无大益。我不砍你们的脑壳，批倒批臭了，死活都一样；“打倒”也不会都死，能硬着头皮过关，后会有期再合作。

后会有期再合作。最高领袖会这么想。他不会在天安门广场找新管家的，不会。

喧嚣噪热的天安门广场上，有些人的白日梦正做得欢势……。

最高领袖是诗意的，有着诗人的激情浪漫。最高领袖是有雄才大略的，非凡的自信、非凡的胆识、非凡的才华、非凡的谋略，也许真是几百年才出了一个。最高领袖又是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他也很会计较、很会耿耿于怀的。这就是常人所具有的缺点了——他毕竟是个凡人。

就我这柴米油盐小女人的小鸡肚肠子，我看文革，就是这么回事。

◇ 归去来兮，良心

无论我们真心投身文革还是无奈投身文革，都想逃避“人不配为人”的境遇。

文革中一部分人的作恶，是人在不能支配自己命运前提下的无奈选择，是“避险”的不择手段；那么，今天，人还能不能自主支配命运？这命是不是属于自己了？

事实是，到今天为止，中国人仍然不能自主支配命运，这命也很难说属于自己。为什么？一是因为“身份”关系，二是因为“体制”关系。

“身份证”只说明你是居住在中国土地上的中国人，没有任何其他信息符号。有关身份的“其他符号”简约着说，分有钱人、有权人、有钱有权人，无钱无权，这最后一类人大概就是现在广义上的“穷人”。

广义上的穷人“不配为人”，这是一个共产党的第三梯队培养对象告诉我的，我是开了眼界的。他公然在过组织生活时说：“穷人就是要把他们赶到乡下去，市中心就应该是有钱人住的。”

怪不得“穷人”生活得险象环生。走在路上查个证件，都能查出命案；睡在床上做梦，竟被拆迁公司一把大火烧死。因为他们“不配为人”，只能象鸡鸭样被驱赶。

“上层人”虽然不至于轻易被判“不配为人”，却更遭着罪。中国的“体制中人”其实是中国最不能支配自己命运的一族，因为他们有“档案”这袋“政治生死簿”管着。“穷人”不在乎档案，“上层人”在乎，晋升、提拔、受青睐都与档案千纠万缠；“穷人”是撂地就能生存（如果没有户口居住证等管着），“上层人”缺乏底层人的生存本领，体力活更是不能为、不肖为也放不下“面子”去为的，一旦离开了“体制”，“上层人”就没有活法了。他们心存着对政治前途事业前程不确定的“怕”，他们没有安全感。如果他们也想“避险”，照样会避得不择手段。这种“不择手段”还挺阳光，挺文明。譬如，遇上“傻旨意”，除了大赞“好呀好”，再凑上几个“傻主意”！如此老百姓就够倒霉一阵子了，老百姓是“傻主意”的“受体”！

中国还有一群靠“抬轿子”为生的。

由于这块土地上是“谁上台谁说了算”，如此就必然有一群“抬轿子”的。这是皇权社会在中国最广泛的“群众基础”。在一个“谁上台就谁说了算”的社会，“抬轿”抬得坐轿人舒服，就能交换到来得更为容易的实际利益，但“抬轿”是需要心理承受能力的“心计活”，要作践得起自己，要抬得起别人；这种活干不了多久，人性就被扭曲。人性扭曲，心态就阴暗，阴暗的心态是培育恶行最适合的土壤，一旦冲破道德束缚，恶行就如黄河决堤泛滥成灾，如我们亲身经历的文革一样！

所以，我们不但有极大可能再“助纣为虐”，为“助纣为虐”找出的理由都有一大筐呢。最有说服力的理由是：人是社会性动物，人是沧海一粟，改造社会的只能是少部分人，大部分人是在消极适应社会，根据社会动向在调节自己的行为。在有安全感的社会里，人的适应行为是“向善”的，在没有安全感的社会里，人的适应行为必定“向善”。

但是，是人，总得给行为设个底线，这个底线，就是良心。几千年间，绝大多数中国人是不敢破“良心”这个底线的。1949年后，这个底线逐渐破了；1966年，底线崩溃；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度想修补没有修补成，进入二十一世纪，想补，竟然无从补起……

不过，人们总算发现了三鹿奶粉、溃坝、溃矿、毒鸭蛋、毒辣子粉、毒大米、毒火腿、毒咸菜、抽去了钢筋的溃桥塌楼造成的所有触目惊心的死亡，都归结于“没有良心”！山西小煤窑中奴隶的现身、珠三角宿舍里烧死的打工妹们的冤魂，都在控诉：这个世界那么富有，独缺良

心！

归去来兮，良心！

良心回来容易吗？应该不难呀！只须想一想，那些吃的，我自己会吃吗？那些楼房，我自己敢住吗？良心不就回来了？村妇愚夫懂的道理，能有多高深？

良心，魂兮归来呵！

◇ 少投身“举国”活动，避免再“助纣为虐”

现实的问题是，我们能否保证今后不再助纣为虐。

肯定不能保证。能保证的是，我们肯定还会助纣为虐。

大跃进是场灾难，文革是场灾难。但是，这不是最高领袖故意要发动灾难，1957年他提出15年赶超英国，1959年认为赶超英国，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他也是在给自己加压。他在中南海的炼钢工场里观看工作人员打铁时的照片，是从心底流露出的满脸欣慰——怎么都不像要制造灾难。

但是，他的确实制造了无与伦比的灾难！除了性格特点、文化传承、制度惯性等大家都无数遍谈过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人拥有了支配全国所有资源的权利！他甚至可以一人推翻全国人大通过的国民经济计划，信口说个“干脆翻一番”，不经论证不经调研更不经人大审核就“大炼钢铁”、“大跃进”了！

这是一种擅自支配国家资源的权利。凡是对“国有”的资源支配可以不受监督、不能监督的权利，都属于“擅自支配”。

1949年后实行了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将全国所有资源的支配权集中起来，集中到一个人身上，随着能集中支配的资源越来越多，“擅自支配”的资源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广，造成的灾难也达到了空前。

任何社会活动，都是需要投入资源的。即使“革命运动”，每一个人一方面是被投入的资源一分子，同时也是使用资源的一分子——红卫兵大串联中，红卫兵个人是运动中投入的人力资源，免费乘坐火车，那是在使用国家资源；学校工厂铺天盖地大字报，从笔墨到纸张都是国家资源。

文革不仅是政治活动，也是经济活动。文革其实更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如果动用“举国资源”作恶，这个恶行可以作到什么程度。

“举国”的资源来源是“举国”的老百姓个人资源都被国家计划了去——1966年，6.12亿农民人均储蓄余额2.4元，1.33亿城镇居民人均储蓄余额43.4元。那时一双沪产女式牛皮鞋12元，一件沪产女式羊毛衫24元，一块上海牌手表120元，一百斤大米十五、六元。

我们很富，富到每个人都拥有“国家资源”；我们很穷，穷到除了“国家资源”每个人什么也没有。我们个人都是国家资源的一部分，我们要创造国家财富（新资源），但是，创造财富不能凭空创造，创造财富（新资源）先要利用原有的资源，所有资源都是国家的，利用多少国家

资源、利用那些资源、准不准许利用，需征得“国家”同意，国家不让你使用资源，你就不能创造财富（新资源），你也就没有了生路。文革下乡，就是国家不让你使用城里的资源，你不能通过城里资源创造新财富（新资源），你在城里就活不下去。文革中“出身不好”的子女，就是被剥夺了利用参军、上大学等国家资源改变命运的机会；文革中人们随大流，也是人们不敢轻易放弃利用国家资源来谋生的机会，否则说句公道话或不对天天见面的同事违心喊“打倒”，本没有什么困难的。而计划经济时代人民生活得比较好的地方，就是有更多国家资源可准许使用的地方。

卡住了资源，就是掐住了命脉。不用多劳神，你自己就“不乱说乱动了”，那叫“识相”。

改革到现在，出了很多很多弊端，引出了人们对改革的诸多反思，我就是写了大量反思文章的一个。但是对于1978年开始的那场改革本身，我坚决拥护。只有改革，中国才有希望，这就是我——一个经历了文革的普通工人在1978年的认识。从1978年起，我无比欣喜地注视着改革带来的每一个变化，这些变化与我的个人生活息息相关。只不过从90年代开始，这个改革变了味，改革成了剥夺大众利益的借口，并越加肆无忌惮。但是，这个“改革变味”与“改革初衷”完全是泾渭分明的两码事。并且，1978年的改革冲破了几十年的沉闷空气，终于使得今天的人们对于“活法”有了多种选择。人民能选择自己活法，这是当代中国最伟大的进步。当然，“繁荣娼盛”决不是文明社会要选择的活法，不过，在追究“娼盛”的原因时，我觉得应该这样思考：如果国家掌控支配的大量资源不是一味向房地产等不能创造再生产机会的行业不可思议地倾斜，不从事“娼业”而从事其他健康行业的机会不就有了吗？而不让人民追究国家资源的用途，不就是在为“繁荣娼盛”现象助纣为虐吗？

现在我们国家（包括垄断部门）所能掌握的经济资源经济力量，文革时根本不能比拟。有权支配资源的在“擅自支配”资源，大家都见了的，对“擅自支配”现象不让追究，大家都见了的。那么，这二十年来的那么多的资源投入，都是在为人民造福吗？如果是，能拿出账本来吗——我2006年已经拿出“有相当多的资源不是在为人民造福”的有图有表的详细账单了，为什么至今没有回应？

中国只要还热衷于搞“举国”活动，就说明有“举国”的资源足以供“国家”支配。只要“能说了算的”（包括垄断部门“能说了算的”）对“举国”的资源拥有“擅自支配”权，比文革再大的灾难都不会离我们很远，而“对人民权利的侵犯”还算最微不足道的呢。

我已经在考虑，那些“举国”的活动，应该尽量不参加为妙，因为参加进去，不知道“能说了算的”是不是在“擅自支配”“举国”的资源，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又在“助纣为虐”。

我们“助纣为虐”怕了。

改造社会的只能是少部分人，大部分人是在消极适应社会，根据社会动向在调节自己的行为。在有安全感的社会里，人的适应行为是“向善”的，在没有安全感的社会里，人的适应行为必定“向善”。

但是，是人，总得给行为设个底线，这个底线，就是良心。

~~~~~

【亲历者言】

李震之死

（编者注：施义之是原公安部副部长。其妻是顾准的妹妹。文中余注为余汝信所加。）

“九·一三”事件前后，中央从地方调来不少干部参与决策。有上海的王洪文，湖南省委书记华国锋，北京市委书记吴德。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王洪文被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华国锋、吴德被选为政治局委员。

公安部参加党的“十大”的代表是李震、张其瑞。在“十大”会上李震、于桑被选为中央委员。自1970年谢富治得癌症治疗期间，李震即代部长工作，1972年谢富治病逝，李震任部长。（余注：李震自1970年6月即任中共公安部核心小组组长，部革命委员会主任（对外称部长）；张其瑞，原公安十一局一般干部，1970年6月起任部核心小组成员；于桑，原公安部副部长，1970年6月起任部核心小组副组长，部革委会副主任；施义之自1970年6月起任公安部核心小组成员，部革委会副主任。以上详见笔者《1973：李震之死始末》。）

1973年10月21日，公安部发生一件大事——李震的死。

关于“算旧帐”问题的争论，在很长一段时期成了核心小组中矛盾的焦点，无论中央领导怎样批评，也无法使问题真正解决。遵照周总理指示，应该统一思想，统一思想后写报告报国务院。李震起草的报告中有“‘算旧帐’有损于文化大革命，有损于毛主席”的话，于桑不同意，经核心小组多次讨论意见还是不统一。“报告”拖了很长时间定不了稿，直到李震死的前夕，在核心小组会上讨论时还争吵不休。报告最终流产。（余注：据施义之说，“算旧帐”是“批林整风”时纪登奎对公安部部分人的批评。此后，公安部由上自下产生了“算旧帐”与“反算旧帐”、实质上是如何看待文革的意见之争。李先念也曾批评“‘算旧帐’名义上炮口是对着林彪，实际上炮弹落在群众头上”，并要部核心小组成员各自做自我批评。）

1973年10月20日是星期六，晚上开的核心小组会上因讨论报告意见不一，于桑同曾威拍桌子争吵起来，会开不下去了。21日是星期日，我因发低烧和牙疼躺在家中，白天李震来看我。他心情很沉重，说：“你看昨晚又吵起来了”。我劝道：“意见不一吵几句没有关系，只要你不吵就行了”。坐了一会他就走了。领导班子思想不统一，无法向上交代，我非常同情他。（余注：曾威，1955年授少将军衔，原任北京军区工程兵政委。1967年调公安部任领导小组成员，1970年6月任中共公安部核心小组副组长，部革委会副主任。1975年5月调回部队任天津警备区政委，1983年9月离休，1988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22日，我去北京医院看牙，9点多钟秘书打电话到医院，问我知不知道李部长上哪去了。我忙问怎么回事，他说昨晚一夜李部长都没有回家，现在还没有找到。我说我不知道。当时我没当回事，心想可能有事出去了，半夜被召到国务院开会是有常有的事。11多钟我从医院回来，径直到五号楼（核心小组开会地点），看见于桑、曾威、刘复之、黄庆熙、刘湘屏（谢富治夫人，住公安部院内）、张其瑞等人都聚在五号楼门前，气氛很紧张。在人群里还有李震秘书郑爱萍和其他干部。他们告诉我已到处找过，五号楼地下管道内也找了，没有。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呆站在那里，似乎有不祥的预感。（余注：刘复之，广东梅县人，1937年11月参加中共革命，延安时期曾先后任朱德、刘伯承、邓小平的秘书。后长期在公安部门工作，文革前为公安部副部长，文革中受过冲击，1970年6月任中共公安部核心组成员；黄庆熙，文革前为内务部副部长，文革中受过冲击，1972年1月任公安部副部长。）

组织人再去找，包括全院子的地下管道内都要找。结果两位工人在大院东南角的一个地下管道口内发现了李震的尸体。工人出来时，刘湘屏回家正路过，刘马上叫人通知我们。得到通知以后，我和于桑、曾威、刘复之、黄庆熙一同赶到那里。刘湘屏要于桑、曾威下去看看，关照不要动，不要破坏现场。他二人上来后告诉我们，李震是半躺半跪在地下管道里，脖颈勒有绳子，吊在管道上。

这时立即电话报告国务院和周总理。22日当晚，于桑从国务院回来召集核心小组开会，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李震极大可能是被害”，于桑、吴忠（北京卫戍区司令）、杨俊生（北京卫戍区政委）、杨德中（8341部队政委、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刘传新（北京市公安局长）等组成破案组，从外地调来几名法医，着手破案。（余注：杨德中时任中办警卫处副处长（警卫局改称）兼中央警卫团政委，其任中办副主任是在文革后的1980年至1994年；刘传新，原陆军第27军副政委，1967年2月起任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副主任、局长。粉碎“四人帮”后受审查期间自杀身亡。）

23日，于桑、刘传新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到部里宣布对李震的秘书郑爱萍隔离审查。下午破案组与核心小组听取公安局勘察现场初步情况的汇报。当时吴忠说：据周总理的秘书讲，21日晚他给李震打电话时，李还谈笑风生。

晚7时左右，周总理把全体核心小组成员找到国务院会议室，要我们谈各自的看法，我说：“我同意周总理的判断，他为什么要自杀？极大可能是被害”。刘复之说：“可能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矛盾集中到他身上”。周总理在会上指定破案组由华国锋领导，张其瑞参加破案组，同时增加了郭玉峰（中组部长）、田维新（总政治部副主任）。指示公安部核心小组要同心协力配合破案组工作，主要是部内发动群众提供线索。（余注：郭玉峰，原陆军第64军政委，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业务组负责人，1975年6月始任中组部部长。）

24日，我参加了破案组的一次案情分析会。据李震爱人反映：21日晚李在家接到一个电话后去的五号楼，说是去开会。一夜没回，到了清晨问秘书郑爱萍，郑一点也不急，催问几次才去找。针对什么样的电话能把李震引出去，会上大家分析可能山东的案子（具体内容我不知道）或是李洪枢案（苏修派遣特务）。在会上我得知李震除服了大量安眠药外，口袋里还有安眠药，是潮湿的，有口袋布的压印，似乎是从口中吐出来的，正在取样化验，还不能确定死因。但大家的思路仍集中在“他杀”的问题上。

10月26日下午，郭玉峰、田维新通知我们，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公安部核心小组全体成员开会。郭玉峰、田维新同我们一起前往人民大会堂。进了人民大会堂前厅大门，于桑走在前面。突然，守候在这里的杨德中指挥8341部队的战士上前一左一右把于桑架走了，随后的刘复之也被架走了。我跟在其后，见此景一惊，马上停住脚步没敢动，等待也被架走。这时杨德中说周总理在里边等着你们，把我、曾威、黄庆熙、张其瑞引进福建厅。厅里，周总理、叶剑英、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江青、张春桥、吴德等已坐在那里，除朱德之外的政治局委员几乎全部在场。还有吴忠等人，稍后汪东兴到。

我们进去后，杨德中请示周总理怎样向于、刘二人宣布，总理说：宣布“保护审查”吧。杨德中出去宣布后回来，周总理问他俩有什么反映，杨德中说：“于桑问为什么，刘复之讲：‘好’”。周总理说：“这完全反映了这两人的性格，一个像恶霸，一个像军师”。接着讲“李部长是被害。我把陈锡联同志请来了，他很了解李震。李震在政治上中央是信任的，工作上中央是支持的，家庭生活是和睦的，没有自杀因素。李震死后，于桑、刘复之表现不好，破坏现场，幸灾乐祸。公安部长被害，建国以来是没有的，比谭甫仁案子还严重。李震死在党的十大后，四届人大前，你们要想的深一点、远一点”。总理还说：“李震被害的教训是他政治上软，受到批评就知难而

退，想回部队”。接着，要我汇报部里“算旧帐”和反“算旧帐”两种意见分歧的情况。在我汇报过程中，纪登奎插话：“李震就是软，一软就转，一转就死”。汪东兴插话：“他们（指于桑、刘复之）是反文化大革命、反党中央、反毛主席的”。当我汇报到“我感到公安部有一股落后势力”时，江青插话说：“什么落后势力，是一股反动势力”。在汇报了核心小组内吵架的事后，我说：“我没敢想于、刘会是谋害李震的后台”。江青插话：“你们的思想还停留在吵架阶段，于、刘不是后台，跳到前台来了”。还说：“于、刘是转移方向，向党进攻”。会上叶帅也强调要想的深一点、远一点。这次会后，在我思想上有这样的感觉，党中央、周总理已掌握李震被害材料，李部长被害可能是于、刘支持的。

在这次会上，周总理指定我临时负责核心小组工作。我毫无思想准备，当即就说：“我各方面比李震差远了，负责不了”。周总理批评我没有信心，并说：“有事可以请示国务院嘛！”。江青说：“你不要把部队当成娘家，地方当成婆家，娘家、婆家都是共产党”。在这个严重时刻，当着众多的政治局委员的面，我不能再说什么了。周总理指示我第二天就召开千人大会，充分发动群众揭发、提供线索，配合破案组，限一周破案。还指示吴忠、杨德中、郭玉峰、田维新参加大会，去撑腰。周总理还要吴忠加强公安部大院的警卫，要封闭公安部大院的两个旁门，有个政治局委员（记不清是哪位）提出不要搞得太紧张，周总理就没有坚持。

回到公安部已是27日凌晨4点多钟，我即找人起草动员提纲。提纲经华国锋定，下午3点召开了动员大会，我作了动员讲话，第一句话就是“李部长被害了”。我传达了中央指示，说明李震在政治上中央是信任的，工作上中央是支持的，作风正派，家庭美满，没有自杀因素，绝大可能是被害。事情发生在党的十大以后，四届人大之前，很不正常。动员大家以党性原则揭发可疑点，追查到底。还传达了中央指示我们关起门来整顿，停止对外工作联系。我在大组和治安组会上表示了我“不破此案，死不瞑目”的决心。动员会后，以自报公查的方式

查了每个人21日晚的行动，牵扯了很多入。

揭发的线索，涉及公安部内部的由公安部查，涉及部外的由北京市公安局查。

27日晚，破案组来电话要我去北京卫戍区。在卫戍区办公室，吴德交给我一份审查对象的名单，有十多人，要我们隔离审查。我看后提出人数是否多了，吴德说请示周总理后再说。接着他出去了，过了一会他回来后把名单交给我，名单没有变化，但审查方式改为隔离审查、在职审查、传讯三种。破案组决定对莫国基（刘复之秘书）、徐仲久（部长办公室公务员）、戴文殿（于桑秘书）、刘均（原一局处长，同李震一起搞专案）等人组织群众专案组进行审查，专案组的人选是由核心小组讨论决定的。

28日，华国锋打电话找来了天津的解学恭，当时在场的有吴忠、刘传新和我。布置了对刘复之、王万沐（日本华侨，刘复之的远亲，正在国内。在公安部的档案中被称为特嫌）和刘在天津的两门亲戚进行审查。对他们的审查，在天津的由天津市公安局负责，在北京的由北京市公安局负责。我后来得知对刘、王的审查是周总理向毛主席汇报李震案情时经毛主席同意的。

10月底，破案组要我到卫戍区，在那里刘冰清（国务院办公厅副主任）向我传达了周总理亲笔写的对郑爱萍的十几个疑点内容的字条，并指示我们组织七、八十人查批郑爱萍。回公安部后，我向核心小组作了传达。讨论决定由苏玉涵（专案三办办公室主任）、姚伦（原预审局副局长，后抓专案工作）、侯西斌（原边防局长）负责查批郑爱萍的工作，破案组的刘传新、李久合（原交通保卫干部，干校回来后到北京市公安局工作）向他们传达了周总理提出的疑点。过了几天，刘冰清又带来了周总理的指示，要我亲自主持对郑爱萍的查批会。我主持过几次，记得会上郑爱萍提出了李震自杀的十一条理由，具体内容现已记不清了。（余注：此处关于刘冰

清的记忆应有误，1970年6月后设立国务院办公厅，撤销国务院秘书厅，办公室未设行政负责人职务，由中共核心小组负责。苏玉涵，应为苏宇涵，文革前为公安部十三局（预审局）局长。）

11月上旬，吴忠向我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破案组要发动群众，至少要动员千人以上来揭发，要放几把火。要集中批郑爱萍、莫国基、戴文殿、徐仲久，对于桑、刘复之也要揭发。公安部要关起门来整顿。公安部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已发展到对抗，杀人夺权的地步”。周总理还说：“我就怕侦察工作上赔了夫人又折兵，我们没有经验，帝修反是有基础的，斗不过人家”。吴忠说对周总理的指示如何贯彻要听华国锋的安排。

我意识到党中央对李震的死是从国际这个大背景来考虑的，所以要我们想的深一点，远一点。把李震的死和国际反动势力连在一起，感到触目惊心，工作上压力很大。但有周总理坐镇指挥，又有华国锋的直接领导，我全力配合破案组工作，有事可直接汇报，心中有了底。

11月14日华国锋对我说：“中央为了加强公安部的领导，已决定调杨贵、祝家耀、徐海涛（杨是中央候补委员，原林县负责人，时任河南省革委会生产指挥部负责人；祝是中央委员，上海造反派头头，时任上海市事务管理局局长；徐是部队干部，时任总政保卫部长。他们作为接班人到中央读书班学习）到公安部，参加核心小组，部里也可以选人参加核心小组，不成熟的话，可以临时参加或列席会议。”还说：“总理指示重点审查对象是郑爱萍，至少动员千人以上大会揭发批判，除查破对他们的疑点外，要批驳他提出的李震自杀的理由和他的目的”。“从现场看是自杀的样子，但分析没有自杀的因素，我们必须从阶级斗争高度来分析。吴忠去天津发现刘复之与王万沐的关系，问题就更复杂了。”还指示说：“群众揭发的线索已不少了，下一步要查与于、刘搞阴谋诡计有牵连的人和事，一起揭、一起批，实际上要与两条路线斗争挂起来，这样对破案有利。但要注意团结大多数，掌握好政策。”后来在揭批过程中，出现了“上帮下促”的现象，这样把思想认识与破案线索混淆，扩大了批判面，不利于团结大多数，经纠正制止了。（余注：上述原书对杨、祝、徐三人的注不大准确。杨贵时任中共河南省委常委，林县县委书记。1973年11月至1979年7月任中共公安部核心组成员，河南省委常委，1979年7月后任五机部渤海农场副场长，国务院三西地区农业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等职；祝家耀，原上海5703厂工人，文革中参加上海“工总司”，后任上海市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人，1973年11月至1977年6月为公安部核心小组成员，1977年6月至1984年6月隔离审查，1994年赴美国定居；徐海涛，原上海警备区警备师政委，时任总政保卫部副部长。）

11月17日，杨贵、祝家耀、徐海涛到公安部参加核心小组工作。中央决定杨、祝、徐参加破案组，同时增加了罗青长（中央调查部长）、刘湘屏（卫生部长），决定我也参加破案组的工作，由祝家耀分管政治部，负责内部发动群众。不久，徐海涛被调走。

张其瑞回来把破案组在检查刘复之的文件时，查到的一份公安部局、处领导班子配备名单交到核心小组。这份名单上有李阳及其他七、八名曾含冤入狱的局级干部。经核心小组大家讨论认定，李阳是1972年获释恢复工作后不久因病去世的，他去世前，名单上的几名局级干部尚未出狱。推论这不是核心小组商定的公安部局级领导班子配备名单，而是刘复之自己确定的名单。随即向华国锋和破案组汇报，华国锋要我们写成简报报中央。核心小组在简报中，上纲到“翻案”，“复辟夺权”。（余注：李阳，似应为李祥，文革前为公安部七局局长。）

关于“算旧帐”的情况，虽然已口头向周总理汇报过了，但纪登奎要我们写个书面报告。因为文革中核心小组会一直没有正式记录，就在核心小组会上根据每个人的记录和回忆相互补充写了个书面报告报中央，由于工作上的疏忽，报告上没有说明这是根据核心小组成员个人记

录和共同的回忆汇集的。

12月的一天，核心小组全体成员参加了破案组会议，听取了祝家耀发动群众的综合汇报。会上华国锋说：“没有调查研究说李震是自杀是错误的；不调查研究说是他杀也是不对的，结论应该在调查研究之后”。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中央领导人说李震之死有自杀、他杀两种可能。华国锋还传达了毛主席在听取周总理的汇报之后说：“为什么要杀人呢？要调查研究”。毛主席举了明代发生的三大疑案。华国锋在会上嘱咐我们，这些指示由核心小组掌握，暂不向下传达，以免松劲，工作仍照常进行。（余注：明朝三大疑案，指发生在明末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的梃击案，泰昌元年的红丸案和移宫案。三大案均与明光宗朱常洛有关，反映了明末宦官专权，党争不断，在皇位继承问题上充斥着激烈的明争暗斗。三大案均未能深究，尤其前两案更不了了之。）

由于我缺乏历史方面的知识，当时回来后翻了历史书籍，才知道毛主席举的是三起明朝宫廷内发生而没有查清的案子（具体的内容记不起了）。

1974年1月初，破案组确认李震是自杀。核心小组研究决定分两步向下传达。先讲存在他杀和自杀两种可能，然后再讲是自杀。经华国锋批准后，召开了大组长和处以上干部会议，由杨贵按两种可能作了传达，并代表核心小组承担了前段审查工作中的责任。

1月中旬的一天，华国锋召集核心小组成员到北京卫戍区开会。华国锋说：经调查，李震的死与于桑无关，解除对于桑的审查，刘复之不能放，继续审查。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中央站得高，看的全面，我没意见，坚决执行。但要给点时间做思想工作”。华说给一周时间。同时华国锋指示我和吴忠一起去接于桑出来。还指示除刘复之外，其他人都宣布解除审查。为了给公安部做善后工作的时间，会上决定于桑出来后先在中组部招待所住几天再回家。

会后华国锋要我随他一同去大会堂向周总理汇报。在车上华国锋对我讲：在阶级斗争复杂的情况下，当时从被害的角度审查是必要的。向周总理汇报时他也是这样讲的。周总理指示，于桑回部后，你们要抓紧时间对他的错误进行批判，这个人什么都不在乎，批判他，一是挽救本人，二是教育大家，提高思想。华国锋写的解除于桑保护审查的报告，主要内容是：于桑与李震的死无关，但于桑在公安部的错误是严重的，回公安部后要接受群众的批判，自己要作认真的检查。第二天，我同吴忠拿着周总理批准的报告给于桑看了，把于桑接到中组部招待所。后来于桑回部作了检查，经大小会数次批判后恢复工作。根据周总理的指示，仍为核心小组成员。（余注：于桑1974年2月解除关押。1976年10月至1977年8月参加“王张江姚”专案组工作，1977年8月至1982年6月任公安部副部长，部党组书记。）

到了1974年底，在一次破案组会上，吴忠提出应解除对刘复之的审查，隔离久了对他的身体不利。华国锋表示同意，并具体指示：解除刘复之保护审查后安排回家，不恢复工作。大约在1975年5月，刘复之要我替他转给周总理一封信，信中说他在卫戍区保护审查期间，曾威带人到他住处安装窃听器。周总理批示要吴忠查。经吴忠查没有此事。华国锋让杨贵、于桑找刘复之谈谈。在一次华国锋参加的核心小组会上，杨贵、于桑汇报了同刘复之谈话的情况，会中有人说这不是对曾威个人，是对破案组的。华国锋说：“不是对破案组，实际上是对我的”。（余注：刘复之1977年12月至1980年11月任文化部副部长，1980年1月起历任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司法部部长，公安部部长，武警第一政委，中央政法委副书记，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自此，李震之死的案子基本结束。

从个人角度讲，对于李震的死，我是很惋惜的。在他领导下多年，得到过很多帮助，我们



的关系也很融洽。李震在他的位置上负责的事情多，了解的事情深，自身的工作压力和思想矛盾又极少透露，我对他的内心了解甚少。他死前，我看到他按中央要求处理干部中对文化大革命的分歧意见及争执进行不下去的困难处境，是很同情的。他死后我从感情出发最初无法接受“自杀”一说。认为他不会自杀，也不应该自杀。

李震之死引起中央的很大震动，在中央领导下，采取了一系列紧急处理措施。中央领导人在案发后的一段时期将此案与国际国内阶级斗争联系在一起，强烈倾向于认定“他杀”，这确是事实。

我当时对中央领导人的这种判断，在思想上是一致的。周总理在关键时刻点了我的将，要我负责核心小组工作，我提出过胜任不了，但中央决定了，我只有全力以赴的投入工作。

两个多月的清查，使许多干部被牵连，被批判，被隔离，受到了伤害，对此我感到十分歉疚。当确定李震是自杀后，我实事求是的在思想认识和工作中及时做了调整，坚决贯彻了中央领导的指示。

□ 节选自陈枫根据施义之口述整理摘录：《血与火的历练（二）——特殊环境下的十年经历》，《血与火的历练》，页59—67。

~~~~~

【各抒己见】

没有“粉碎四人帮”，中国后来会怎样？

• 曾节明 •

历史不能改写，不等于历史不能假设，因为历史在成为历史之前，几乎无一例外的存在多种演变的可能性，可能性最大的那种，也并不见得成为其后的既成事实；非假设，不足以推演历史的多种演变可能、不足以对具体历史事件及其成因后果进行具体、全面、透彻的分析，“以史为鉴”就会成为空话。

1976年九、十月间的中国，处于毛泽东死后的重大抉择的历史十字路口，本文尝试推演当时的一种历史走向，即：如果没有“粉碎四人帮”，中国后来会怎样？

要推演这种走向，先看这种走向当时是否可能，即当时能够影响历史的关键人物，是否存在不粉碎四人帮的选择。答案是肯定的，1976年10月，唯一有能力抓捕“四人帮”的关键人物华国锋并没有抓捕“四人帮”的被迫，因为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当时并没有蓄谋推翻华国锋的行为，江青等人以邓小平等元老为敌人，从来没有把“老实人”华国锋当作铲除的对象。因此，清除四人帮并非华国锋为了自保的必选项。

许多人认为华国锋“粉碎四人帮”是出于忧国忧民，说什么当时为了救国，就必须清除极左势力云云，这完全是事后聪明的牵强附会：华国锋一直忠于毛泽东路线，其上台后高举“两个凡是”，继续“抓纲治国”，其政见和政策与“四人帮”有什么本质区别？可见，“粉碎四人帮”与“救国”根本无关。

因此，华国锋抓捕四人帮，完全是一次“额外”行动，而非必须选择。事实上，搞掉江青以求自保的人是汪东兴，因为汪东兴与江青不合，江青作风又素来飞扬跋扈、睚眦必报，汪担心毛泽东死后，江青会算他的帐；因此，汪东兴就以支持华国锋取代江青当一把手为利诱，怂

息华合伙政变。尽管汪东兴有搞掉江青必需，但若没有华国锋的合伙，汪东兴既不敢、也无能“粉碎四人帮”：汪东兴当时虽然身为中央警卫局局长，掌握御林军枪杆子，但其人连常委也不是，在党内资历平平，名器和权威都无以服众，也无法影响北京卫戍部队，汪东兴如果个人莽撞起事，必然后果很严重、下场很难看。因此，如果没有当时中央警卫局政委华国锋的连署，汪东兴决不敢调动八三四一部队政变。

可见，不“粉碎四人帮”的选择完全存在，而且是“正选”（“合法”选择）；因此，不粉碎“四人帮”的中国历史走向不仅有可能，而且可能性很大。

但是，可能性很大的事情经常不会发生，可能性不大的变化反倒成为事实，这就是历史的吊诡之处。在汪东兴的竭力鼓动下、在叶剑英、陈云等元老的怂恿下，华国锋利令智昏地实施了“粉碎四人帮”的宫廷政变。表面上看，华国锋、汪东兴等人通过政变成功夺权，实际上，备受“四人帮”势力压制的邓小平、陈云等元老才是“粉碎四人帮”的最大获益者：华国锋的政变，让本来无望的老东西们死灰复燃、咸鱼翻身，为其卷土重来敞开了大门。

总之，“粉碎四人帮”并非历史必然，其之所以发生，主要是因为华国锋的愚蠢：如果当时华国锋少一份贪心、多一点眼光，“粉碎四人帮”就不会发生。

如果没有“粉碎四人帮”，中共政权这台庞大的机器，将以巨大的惯性，按照毛泽东生前主导的方向继续运转。依照毛泽东的交班指示，江青将在1976年十月下旬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中共党主席、张春桥任副主席、军委副主席、王洪文任人大委员长、华国锋任总理和党的副主席、毛远新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监视华国锋、姚文元进常委，掌控全国宣传舆论机器、铁杆毛派陈锡联出任军委主席。

在这样一个权力格局下，叶剑英被边缘化、邓小平、陈云、彭真、李先念、王震、薄一波等元老没有任何掌权或“复出”的机会。

全面掌权的“四人帮”势力，必将继续毛泽东文革路线，即：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明确社会主义继续革命对象就在共产党内，把限制官僚主义者阶级特权和反修防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这势必带来如下发展变化：

继续党内残酷路线斗争继续，没有华国锋的破局，邓陈派势力根本无法翻身，将彻底沦为“继续革命”的对象；因为邓小平、陈云、叶剑英等人的资历在“四人帮”之上，成为江青等毛派新贵的头号威胁和巩固权力的障碍，必欲除之而后快；事实上，江青早欲清除邓小平等元老，邓小平、陈云等人，之所以在文革中未被整死，全因为毛泽东的“留一手”，毛泽东死后，这些老东西们的身家性命已经操纵在四人帮的手里，没有了毛泽东的手下留情，邓小平作为“党内最大的、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右倾翻案风幕后黑手”，一定会被永远开除出党，邓与其走资派骨干分子彭真、杨尚昆、胡耀邦、赵紫阳等人将被押送南方老少边穷地区改造，邓小平本人很有可能被活活整死。叶剑英、陈云等内心否定文革的正统共产党党徒，因其圆滑可能会躲过挨整的命运，但因叶并不为毛泽东放心、陈云更被毛贴上了“此人一贯右倾，不能重用”的标签，因此会被四人帮打入冷宫，或送去“养病”，政治生命提前结束。

在宣教文化上，中共政权将继续造神运动，国家宣传机器将掀起对新党魁江青的个人崇拜运动，以神化毛泽东的方式来神化江青；对外继续闭关锁国，老百姓在八十年代继续受到彻底洗脑，他们既没有八十年代反思文革的启蒙、也没有因对比台湾、美国生活水平的梦醒，从而

仍然普遍沉醉在平均主义的幸福感当中，沦为象今天朝鲜民众那样的重度愚民。

经济上，“四人帮”统治集团肯定继续计划经济和人民公社。

“一大二公”是一种缺少利益驱动的经济体制，在这种经济体制下，人既没有创造的积极性，也没有破坏的积极性；这一方面必然造成效益低下、浪费严重、经济发展迟滞，一方面，也不会出现随“改革开放”而来的严重的资源流失、环境污染、生态恶化；老百姓生活贫穷但平均，但没有明显的贫富差距、没有显着的官民差别；计划经济的短缺和配给制性质，杜绝了官僚集团整体性贪污腐败的可能；由于缺乏发展房地产和城市化的动力，中国决不会出现今天极其恶劣野蛮的强迫拆迁、强迫征地现象。

因为计划经济具有这些特点，因此如果由“四人帮”来统治，中国决不会有尖锐的官民矛盾和深重的社会仇恨；由于几乎人人缺乏额外的牟利渠道，老百姓也不容易产生因攀比而来的奢望和欲求，而容易保持心理平衡；在“四人帮”统治下，中国不会出现愈演愈烈、无法收拾的假钞、假货、劣质产品，决不会出现无孔不入、防不胜防、害人夺命甚至连婴儿都不放过的“三鹿”式有毒有害食品的泛滥成灾！在政治以外的领域，道德和社会风气决不会象今天这样整体败坏、极度扭曲、积重难返。

在“四人帮”的统治下，中国社会不会有快速的经济增长和繁荣，也不会有今天这样的痛苦。

在社会生活上，“四人帮”肯定会保留“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样的“文革成果”；在“群众监督”下，一方面意识形态高压继续，人们战战兢兢，生怕一不小心“说错话”，另一方面官僚干部队伍也不敢太造次、太张狂、太贪婪，以免因经济、作风问题遭群众揪斗。

文化娱乐上“四人帮”会继续奉行文革时期的禁欲主义，大搞样板戏、农村社教、严禁外国“精神污染”。这一方面会维持民众的愚昧，导致一些群体，尤其是知识分子群体整体性压抑和精神苦闷；另一方面，“四人帮”也不会象邓小平那样汲纳资本主义社会最坏的东西，物欲横流及黄、赌、毒等资本主义社会的糟粕不会如今天这样浸透中国社会压抑、苦闷，也不会有性病和艾滋病的泛滥。

生活在这种社会里的民众固然政治愚昧，但情趣不会被完全转移到经济娱乐声色犬马上去，不会形成今天广泛存在的政治冷漠的“经济动物”。

“四人帮”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必定坚决执行毛泽东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决不会给被毛泽东打倒的人平反。由于当年刘少奇、邓小平“当权派集团”基本上被打倒，其他革命元老因毛的“不放心”而普遍遭到排斥，他们的子女不可能受到重用；为了加强对老革命势力的压制，为自己打造牢固的权力基础，江青等人必需启用和提拔大批年轻干部，如此发展，就不可能形成后来以中共元老子弟为核心的庞大的权贵既得利益集团——太子党集团。以“四人帮”为首的中共统治集团，既不可能有宪政民主化的意识，也没有今天中共这种疯狂对抗自由民主的巨大利益驱动。

由于“四人帮”治下不可能有“平反”，中国也就不会有“计划生育”，因为中国“计划生育”的权威鼓吹者马寅初是被毛泽东亲自打倒的“反动学术权威”、“中国的马尔萨斯”，毛泽东还从独裁者需要人力和炮灰的角度出发，亲自否定计划生育理论，他说：“人多力量大，人多好办事，”。

毛泽东一生中虽然做了许多错事，但否定计划生育是正确的；四人帮上台后，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必然继续毛泽东的人口政策，拒绝计划生育。

没有计划生育，中国就不会形成“计生”系统这样一个危害中国人种族命根子的、顽固对抗政治改革的、巨大的既得利益新集团；中国就不会出现大规模强迫堕胎、结扎的新罪恶、就没有今天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性别严重失调、家庭伦理败坏、亲族断层、独生子女心理和性格缺陷、足球等激烈对抗型大球体育项目崩溃、劳动力短缺等系列严重问题和恶性循环；没有计划生育造成的恶果和恶性循环，今天的中国社会将是一个年轻人众多、充满活力、朝气蓬勃的社会，而决不会沦为今天这种“未富先老”、暮气沉沉、积重难返的社会。

综上所述，如果没有“粉碎四人帮”，中共将继续领袖独裁的专制统治方式，不会形成寡头共治的稳定局面，中共高层残酷的路线斗争将继续，并且随最高权力的交接班而激烈化，造成周期性的政治危机，如果碰上全面经济危机，这种周期性的政治危机很容易成为政权崩溃的导火索。

而在“四人帮”的统治下，全面经济危机一定会到来，因为“四人帮”坚持的“一大二公”经济，效益差、增长慢，无法满足人口日益增长带来的物质需求；由于彻底废弃市场功能，计划经济无法象市场经济那样自发调节人口数量，“四人帮”既坚持计划经济，又拒绝计划生育，结果必然造成人口迅速增长，造成计划经济社会不能承受的住房、就业、粮食、医疗、教育等诸多方面的压力，表现出来的就是物质极度短缺、商店空空荡荡、抢购成风、彻夜排队购买物成为普遍现象……这时候，中共统治集团的意识形态洗脑就会大打折扣，就会人心思变。如果刚好在这个时候，在中共高层残酷路线斗争中即将失败的一方，为求自保而“发动群众”，或者索性破罐破摔，揭穿中共老底……就很容易点燃全面的社会动乱，“四人帮”素来在军队中缺乏权威，一旦全面的社会动乱暴发，他们不太可能象邓小平那样成功上演“六四平暴”，中国极可能陷入“乱党乱军”超文革乱局；没有了毛泽东，文革的重演意味着中共的垮台。

即使没有因高层路线斗争引发的社会动乱，经济的危机也会导致中共政权瓦解。一旦经济恶化到彻夜排队也买不到生活必需品的地步，必然引发越来越多的社会骚乱，甚至引发对国家仓库、基地、列车的哄抢，最终必然引发军队哗变、政权垮台。

有人以朝鲜为例，来证明奉行“极左路线”的共产政权更稳固、经济危机不会导致共产政权垮台，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第一，朝鲜面积只有山东省那么大，人口仅两千多万，控制朝鲜相对容易得多，中、朝之间缺乏可比性；第二，朝鲜所需的粮食和能源可以依赖国际援助；事实上，朝鲜的军粮和军用能源大部分依赖中国供给，其共产政权因此得以苟延残喘；若没有中共和国俄罗斯扶持，朝鲜连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大饥荒都熬不过去。

朝鲜政权可以依赖外援维持，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能依赖谁？

就算没有严重的经济危机，“四人帮”统治下的中国也比走上邓、陈路线的中国容易变天。因为没有“改革开放”，中共官僚集团的特权就无法市场化，就不会形成今天死硬阻碍任何体制性变革的庞大的权贵既得利益集团。民主化变革，对于今天的中共权贵来说，是你死我活的根本利益问题；而对计划经济下的中共官僚来说，主要是一个转变观念的问题：没有尝过特权市场化甜头的毛共官僚集团，其对民主化变革的抗拒会比今天的中共权贵既得利益集团小得多。“四人帮”统治下的贫困、意识形态的逐渐破灭、政治斗争的无休无止和残酷，必然使得官、民普遍产生一致的厌倦心和逆反心：在残酷斗争缺乏保障的官僚们，除了特权待遇，没有致富渠道和其他出路，他们因渴望安全和权力资本化而向往变天，老百姓因渴望改善生活也向往变天，而且，由于没有形成声色犬马的社会风气，无论官民，都留有政治关注的热情，追求社会

变革的激情火焰容易点燃…这种官民一致的向往，会形成破局的巨大张力，导致一夜之间红旗落地。

当年的苏联和东欧共产国家，都没有类中共经济改革；东欧“卫星国”中，除了匈牙利之外，也没有“新思维”政治改革，东德的昂纳克、保加利亚的日夫科夫、捷克的雅克什、阿尔巴尼亚的阿利雅，都是僵化顽固的共产党党棍，没有任何“新思维”，结果，这些国家更左更顽固的共产党，反而比开明的苏共更快垮台。

如果没有“粉碎四人帮”，中国肯定没有“改革开放”和八十年代的复兴局面，但也不会有“六四”屠杀了，中共政权将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影响下、在世界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冲击下，与前苏、东共产政权一同垮台。今天的中国，至少已经是一个具有很大可塑性的半独裁政权，类蒋介石大陆政权和普京政权，中国经济将完全市场化、社会充满活力，中国决不会呈现今天这种旧患新疾并发、病入膏肓、社会严重扭曲、危机积重难返的极端恶劣局面，面临分疆裂土、社会崩溃、民族消亡的难以解救的厄运！

“长痛不如短痛”，如果早知道这两种不同的结果，中国与其让邓小平、陈云放松枷锁再折腾上几十年，搞到大局崩坏、不可收拾的地步，倒还不如让毛共势力多统治十多年，然后一举彻底摆脱共产枷锁更好。

极左反而会导致更快变天、更好的结局，这听起来起来象一个巨大的悖论，简直难以置信，实际上这符合一条来自中国的古老真理，那就是”物极必反”。

成稿于二〇〇九年一月二十四日星期六中午

□ 原载《议报》

~~~~~

## 【往事追忆】

### 与军管会较量

• 戴维堤 •

〔编者注：本文摘自《逝者如斯》一书中有关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我又陷入了孤独寂寞之中。一本毛选四卷被我翻了一遍又一遍，许多重要文章我都快背熟了。“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写的多好呀！这是军管会要求每个被审查人员必读的。我联想到军管会已抓出了一千多个“5·16”分子，绝对已陷入四面楚歌之中，军管会打击一大片的错误是犯定了。他们现在骑虎难下，不得人心，进退两难，已同杜聿明差不多。我心血来潮，想说点什么。于是，我给军管会写了一封信，劝他们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军管会的首长、同志们，你们好！你们都是好人，老革命，有许多功劳。你们打过淮海战役吧？一定认识杜聿明。但是，功劳归功劳，错误归错误，你们跟着共产党和毛主席干革命，打蒋介石、国民党，功劳大大的，你们不愧是解放军的代表。但是，今天你们似乎又老革命又遇到了新问题。今天，你们打击的是革命群众，你们已经犯了很大的错误，而错误的责任应由你们个人来负，不能代表解放军。

你们现在的处境是骑虎难下，进退两难，同当年的杜聿明差不多。

听说738厂已经抓出了一千多个‘5·16’分子，这是你们的伟大胜利。但我相信这绝对是逼、供、信的结果。因为据我所知，所谓的‘5·16反革命阴谋集团’，是根本不存在的，就象秦桧整岳飞的罪名一样，叫作“莫须有”。我向你们保证，738厂也好，北京航空学院也好，只要我不是‘5·16’，那任何人不可能是‘5·16’。738厂的这些‘5·16’，是你们生产出来的。怎样生产的，你们自己知道。

据我所知，文革中，以北京钢铁学院的一个叫张建棋的学生为首的几个学生——最多100个——给周总理贴过大字报，用的是‘5·16兵团’的名字。后来，谢富治抓了他们，周总理让放了。从此之后，北京市再没听说‘5·16兵团’这个名字。抓张建棋时，我正在钢铁学院，亲眼见的。

至于姚文元先生“评陶铸两本书”里提到的那个秘密的‘5·16反革命阴谋集团’，我认为就是指的钢铁学院和人民大学以及社会上几个反总理的家伙，都被抓过。姚文元同志及其他同志要打倒王、关、戚、肖华、杨、余、傅（要知道，傅崇碧可是你们的老司令），说他们是‘5·16’的黑后台，这是中央的事，你们军管会似乎不宜介入。

738厂里这些头头、工人、干部，我不能说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坏人，但他们绝不可能是‘5·16’分子。‘5·16’主要是反总理的，他们没有这个胆，也没有这个水平。我奉劝军管会三思而行，不要再搞逼供信，不要再听信某些人的胡说八道。战场上抓俘虏越多越好，群众中抓反革命越少越好。建议你们不要象妓女苏三那样，总认为洪洞县里没好人。738厂里好人大多的多。

我这封信忠言逆耳，苦口婆心，决无恶意。

此致最崇高的革命烈士后代的敬礼。”

给军管会的信上交之后，我作好了充分地准备：再次挨斗。

然而奇怪的是，军管会几天没理我，邪了门了。难道他们把我的信上报了上面？等候正式逮捕我的命令？文革中，我知道抓人的程序，只要谢富治和中央文革成员以上的人签字，就可把人送进监狱。

不管它，听天由命吧！

一天，军管会领导带领军代表、专案组人员兴师动众地来到我的“牛棚”，同我谈话。

“戴维堤，你给军管会的信我们看了，去掉那些没用的废话，你谈的问题比较重要。我们不抓你的辫子，今天主要听你谈谈。你说‘5·16反革命集团’不存在，那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周总理都号召抓‘5·16’，难道中央错了，你正确？”军代表开门见山，但态度不错，象讨论问题的样子。

“我信上不是说了么，这个问题很复杂，这是中央的事，我不好再说三道四。”我以守为攻。

“你的意思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受骗了？你这意思要上纲的话可是反革命言论，但我们不抓你的辫子。你的辫子太多了，许多话都出了格。”

“我出格我负责，我是实话实说。现在坏就坏在不说实话，净说假话，中央很难听到实话。”

“你这话怎么同彭德怀差不多。彭德怀的下场你不是不知道，你没有彭德怀的功劳。”军代表说。

“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你们不要人微言轻。”我既已作好准备，就不再有所顾及，我把闷在心里的话开始向外倾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指挥的。我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起来造反，大方向没错。我文革中没打过一个人，没斗过一个老干部，在大连我支持解放军，镇压了造反派，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现在两口子被你们关了起来，有家不能回，吃奶的孩子不让见，我当然想不通，当然要骂你们。我们是一年香，二年臭，三年就挨斗，四年、五年成了‘5·16’，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允许老干部犯错误，不允许我们犯错误？这不公平。中央文革是中央中央的“文革”，不是国民党中央文革，更不是希特勒的纳粹文革。你们不是也拥护中央文革吗？谁知道里面有坏人？现在让我们当替罪羊，我想不通。某些人为保他们自己，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毛主席说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我现在就反戈一击，我们上当了，上了某些大人物的当，上了中央文革的当。中央文革某些人自己干了坏事，为了讨好老师傅们，把一切责任推到我们头上，让我们当替罪羊。王、关、戚是大羊，我们是小羊，任人宰割。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整人要找借口，于是就发明一个‘5·16反革命阴谋集团’，欺骗毛主席和党中央，发中央文件，全国铺天盖地抓“5·16”。什么抓‘5·16’？说穿了就是抓红卫兵，整造反派，以此向老师傅们请功，达到保自己的目的。你们也上了当，大抓特抓‘5·16’分子，光我厂就抓出一千多人。你们也不想想，这种抓法，全国要抓出多少人？全国红卫兵、造反派起码占全国一半人，就算五亿人吧！骨干分子也有几千万之多，都打成‘5·16’，都整得死去活来，家破人亡。你们树这么多的敌，搞洪洞县里无好人那一套，这样搞下去，不亡党亡国才怪呢！我就不信这是毛主席的本意。文化革命搞了这么多年了，你整我，我整你，你欠了我，我欠了你。欠债就要还，一年二年不还，十年20年、一百年总要还的。历史学家们会有公论的。历史不一定就全由胜利者写，司马迁就不是胜利者，屈原也不是胜利者。真正的历史，往往是失败者写的。留芳百世的往往不是正史，而是野史。我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反正我豁出去了，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们可以关着我不放，可我决不会自杀。我只要死了，就是被你们打死的。今天在座的人不少，希望给我作证。你们看着办吧！”我一口气讲了许多，把闷在心里的怨气全发泄了出来，心里轻松了许多。

出乎我的意料，在场的人没有发火。专案组的人记录，记就记，反正我不怕。军代表问我还有什么话说，我说没有了，不说了，这些话已经够多的了，打反革命的话，完全够用了。

“戴维堤，你不要破罐子破摔！”军代表说，“到现在为止，我们仍在挽救你，帮助你。你有怨气我们理解，有些话出格我们也理解。你们造反时整的人都全整对了吗？被你们整的人就没有怨气吗？现在轮到了自己头上，应该正确对待嘛！邓小平还向毛主席写检查承认错误，保证永不翻案呢！你是个学生，年轻人，为什么就不能承认自己的错误？承认错误，把问题交待清楚，就是好同志嘛！我们没有把你打成反革命。厂里许多人承认参加了‘5·16’，这是事实，我们也没有全信嘛！也没有把他们都打成反革命嘛！我们军管会的水平没有那么低，不象你所说的那样。今天就谈到这里。你的问题，主要不是我们搞的。你们学校里有材料，有揭发，你总得有个交待吧？今天可以明确告诉你，有人揭发你是‘5·16’分子，是头头，还发展了一些人，这些人都有材料揭发你。我们正在核查，我们不会草率处理的。你要好好学习，认真地检查自己，别老想着出去。学习班有长有短，我们不是私设监狱。隔离审查嘛！没有点限制和压力还行？什么时候想通了，问题也就解决了，今天就到此为止。”管专案的军代表比他们头头周胡砍会讲话。

乖乖，弄了半天，我还是“5·16”。他妈的！究竟是谁揭发我的？为什么无中生有？这样卑鄙！若我知道了他是谁，不掐死他才怪呢？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 0 2 1－8 6 0 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